

资本主义、全球化与民主内卷化

——以特朗普当选为中心

刘广莉 邓曦泽

摘 要:内卷化是一种普遍现象,它同样存在于政治领域。民主也会内卷化,即边际收益递减。特朗普利用民粹主义的社会情绪当选美国总统,就是民主内卷化的一个表征。这一事件颠覆了人们几百年来有关社会发展大趋势的历史观,其重大意义远未被充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已然昭示,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悬殊只会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全球化又加剧着贫富悬殊,而这正是民粹主义赖以产生的温床。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性紧张关系,决定了特朗普无力满足民粹主义的要求,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主的内卷化问题。

关键词:内卷化;民主;资本主义;全球化;特朗普

2016 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可载入人类史册,一是英国脱欧,二是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后者尤其重要。这似乎有点夸大其词,因为这两件事的直接后果尚不显著,何以可载入史册?

的确,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既无战争爆发所产生的即刻效应,也无 2008 年金融危机引发的那种恐慌。但实际上,二者的历史意义远大于金融危机,因为金融危机及更宽泛意义的经济危机乃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问题,它并不改变人类的历史趋势和历史认知。而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的后续影响及意义将远远超出人们目前所知,因为它们逆转了历史发展大趋势,颠覆了几百年来的历史观(尽管这种逆转很可能只是暂时的)。当代主流史观其实是以资本主义史观为代表的进化史观。它表现在世界史层面,乃是全球社会都会进入资本主义体系,形成全球统一市场,甚至形成世界政府或世界国家,全球化则是必然的趋势和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史观也是进化史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包含了最早的全球化理论。因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国人接受了进化史观(历史发展阶段论就是进化史观的一种形态),而改革开放的成功使国人在享受全球化成果的同时接受了全球化主张。虽然反全球化的声音一直存在,但作为全球化倡导者、主力军和大本营的美国与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英国,居然开始从国家层面自我否定,开启逆全球化进程,这是几百年来破天荒的事件。

更饶有兴味的是,全球化逆转是以民主的方式进行的。而最近两三百年来,民主与全球化不但共生共存,并且民主支持全球化。但现在,民主为何开始反全球化了?其实,任何一种制度都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构成它的边界。而在边界内,一种制度会走向内卷化。从内卷化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特朗普当选。讨论民主内卷化,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在理论上,促使我们进一步审视民主的价值,在肯定民主的积极价值的同时,不能将之神化。在实践上,可以了解民主内卷化对美国、

作者简介:刘广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邓曦泽,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四川成都 610064)。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县级政府绿色治理体系构建与质量测评研究”(16JZDW019)的阶段性成果。

世界及中国的影响。

一、“内卷化”概念及其应用

“内卷化”(involution),是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研究印度尼西亚农业生产时提出的概念。黄宗智等学者借以分析中国社会^①,也有学者对“内卷化”作了专门辨析^②。本文无意于对“内卷化”概念作梳辨,而是试图运用它来分析政治现象。在使用之前,根据前人研究,本文对“内卷化”概念予以概括和限定,并讨论它何以能够用来分析经济领域之外的现象。

内卷化有几个特征:

第一,内卷化属于边际收益递减的一种情形。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便停滞不前或进步日趋缓慢,无法转化为更高级模式的现象,这就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形。

第二,内卷化是非线性边际收益递减或复杂边际收益递减。一般的边际收益递减是投入导致的同质收益的递减,而内卷化的收益可能是非同质的,表现出非线性或复杂性。比如,使用寿命是灯具质量的主要指标,如果新投入的生产要素只是为了提高使用寿命,但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那么,这种情况就是线性的或简单的边际收益递减。但是,灯具的质量指标,除了使用寿命,还有造型、材质、色彩等。如果新投入的生产要素除了提高使用寿命,也提高造型、材质或色彩水平,且这种提高也是边际收益递减的,那么,此种情况就是非线性或复杂性边际收益递减。

第三,劳动对象无法再扩大,或者即便扩大,仍然无法有效吸收人力。农业生产较能说明这一特征。在一定时期,土地很难增加(如土地开发比较彻底的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但人口增长使原有土地无法吸收新增劳动力。或者,即便垦荒,如明清时期对云贵川的开垦,但土地增加速度不如人口增长速度,也会导致人力资源过剩。

第四,内卷化通常只用于分析人力要素。在人力过剩的条件下,由于人力本身是自然消耗的,即干活不干活,人力本身都需要吃饭、消化、饥饿、再吃饭……所以,即便边际收益下降,追加人力投入也是值得的。当然,追加也有一个限度。当边际人力投入与边际收益的关系被劳动者认为达到某个极限后,劳动者便会停止追加人力。与此不同,对于其他本身需要购买但又不是(在短期内)自然消耗的生产要素如种子、肥料,收益要大于成本,劳动者才舍得投入。这里的收益是扣除风险成本(如天灾人祸等因素)后的收益。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内卷化不太适用于分析非人力的生产要素。

根据上述特征可以推论,内卷化是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准确地说,内卷化是广泛存在的劳动现象。内卷化(现象)发生的条件有两个:第一,劳动对象达到峰值,或者劳动对象的增加速度小于劳动力增加速度;第二,人力过剩。

根据内卷化的条件,可知内卷化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人类所从事的诸多领域都可能产生内卷化。例如,政治制度也是人类的劳动对象,也需要人们去投入、经营、建设,进而才能从中获益。同时,政治制度自身也是有条件的,它不是一种无限资源。当某种制度能为人们提供的收益绝对减少或相对减少(如最近十年的收入低于上一个十年,或最近十年的贫富悬殊大于上一个十年),这种制度就会出现内卷化。再如,科学也可能内卷化。当某种科学研究范式确定后,学者们在短时间内很难有大的突破,而只是对该范式进行修补,于是产生“精致的平庸”。其实,精致的平庸也好,一般意义的内卷化也罢,都是外部边界确定后,持续供给人力所产生的必然现象。要改变这种现象,只有期待下一次重大创新。而在下一次重大创新之后,又会出现新一轮内卷化。

① 黄宗智:《略论华北近数百年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兼及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② 刘世定、邱泽奇:“内卷化”概念辨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5期;郭继强:“内卷化”概念新理解,《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二、全球化与贫富悬殊：民主内卷化的经济基础

（一）值得重新思考的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关系

当今世界，民主与资本主义共生共存。这很容易让人认为，民主与资本主义是天然和谐的关系。其实并不然。鲍尔斯和金蒂斯指出：“‘民主的资本主义’提出了一套和谐的和彼此支持的制度，每一种制度在社会生活各个不同的领域里促进一种自由。然而，我们将要指出，资本主义和民主不是两种互补的体系。相反，它们是调控人类发展进程和全部社会历史演变的两种反差鲜明的规则：一种规则的特征就是以各种财产权为基础的经济特权的优先性，另一种规则就是坚持以个人权利行使为基础的自由权和民主责任两者的优先性。”^①为什么资本主义与民主具有冲突的一面？因为由资产阶级推动的资本主义，是以资本增殖即资本家逐利为初始动机的，资本家总是希望多获利润，少付工资。基于多数原则的民主却相反。大众总是希望自己多得工资，资本家少赚钱。所以，资本家与大众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而是存在冲突。虽然冲突并非完全不可调和，但又不是完全可以调和。资本家与大众的利益关系乃是动态博弈过程。当资本家与大众利益的冲突达到一定程度，大众就会利用民主机制来反对和否定资本家的统治目标、政策、法律等，而民主也就可能内卷化。

在人类史上，资本主义在刺激财富增长方面超越了历史上的一切制度。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批判资本主义，但也公允地承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霍布斯鲍姆也指出，资本主义将科学的巨大进步视作其最大“政绩”^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对于资本家和大众是一种共赢，资本家增加了利润，大众改善了生活，而贫富差距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因此，资本主义与民主，大体可以说是和谐共生，呈现为一种均势。但是，这种均势被“二战”后加速的全球化所打破^④。

（二）全球化及其经济后果

全球化在资本主义诞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这里需要区分“全球化”的几层含义。

首先，全球化是一种趋势。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概念，但他们预见了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他们认为，全球化趋势，从资本主义诞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近代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发生，人类的交往工具、交往方式发生巨变，交往范围迅速扩大，世界各大洲联成一个交往体系^⑤，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被打破，世界历史开始形成^⑥。所以，“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⑦。

其次，全球化是一种匀质的全球社会体系。在资本主义视野中，全球的价值是它的市场价值。资本主义希望全球是一个统一关税、统一法律、统一规则的统一市场。这个意义的全球化，乃是全球化的最终状态，虽然目前它还远未形成，但相比一百年前，当今世界体系的匀质性提高了很多，不少国际规则对民族国家也产生了相当的约束力，使得民族国家调整国内法以适应国际法——如果这些民族国家想进入全球资本—贸易体系而获利的话。典型案例就是 WTO 规则对国内规则的某些改变。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匀质全球体系是交易费用最低的市场体系，最有利于资本增殖。不过，全球化的匀质性要求可能会冲破民族国家的某些主权特征^⑧。

① [美]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蒂斯：《民主与资本主义》，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

③ [英]艾文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张晓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1页。

④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也是此种均势被打破的原因，但其他因素如技术因素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8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⑧ [澳]约瑟夫·A·凯米来里、吉米·福尔克：《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李东燕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9—110页。

再次,全球化是一种结局。这个结局,就是全球形成匀质的社会体系,即全球是一个统一市场。虽然自资本主义诞生之时,全球化即随之开启,但是,具有明显阶段化特征的是下面两个时段:1870—1914年是第一轮全球化,只持续了44年,然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轮全球化从“二战”后开始至今仍在进行^①。此轮全球化猛烈加速,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是第一轮所不可企及的。

“二战”后,进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的国家,其生产力迅速发展,财富的数量迅速扩大,财富的质量(尤其是科技含量)迅速提升。无论是资本家还是民众,财富积累都有较快增长。在亚洲,日本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亚洲四小龙”崛起,都受惠于全球化。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并在1970年代引发了亨廷顿所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②。这个时期,民主、资本主义、全球化,三者大体是和谐相生的。

随着全球化快速扩大和加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这些变数构成民主内卷化的经济基础的重要方面。

首先,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全球化激活和利用的对象是各国(或各地区)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包括技术、资本、资源、能源、劳动力和市场。要利用这些生产要素,需要降低交易费用^③。1980年代之前,除了发达国家如美、英、法、德、日,新进入全球化体系的国家和地区既无资本和技术优势,资源、能源、劳动力、市场的总量也不大。但19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全球化体量骤然增大。在中国加入全球化体系之际,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已经处于比较劣势,劳动力成本高昂。从短期看,这对大众是好事,因为工资会较高。但是,新的国家和地区加入世界体系,促使全球产业转移,大大改变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劳动力状况,而这一改变便成为民主内卷化的重要原因。有研究指出,在世界主要市场中,中国不再只是边缘化的供应商了,而是对产品的供应以及产品的定价起着决定性作用。在1995年,中国人口已经超过全球总数的1/5,劳动力几乎相当于全球总劳力的1/4。加上印度的人口和劳动力,两国合计在这两项指数上超过了全球的2/5。因此,如果这些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它们有能力影响全球的薪资水平。而且,在全球经济中,不仅非技术的工人,连技术工人也受到威胁,因为中国劳工的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正不断提高^④。当然,劳动力因素不是全球化产业转移的唯一重要原因,资源、能源和市场也是重要因素。

新兴国家和地区加入全球化对美国最重要的影响,就是美国制造业大幅转移到国外,导致“产业空心化”。至少从1960年代以来的明显趋势之一是,服务业就业的增长幅度远远超过制造业。当今服务业的从业人员约占总劳动力的75%,在有的国家比例甚至更高。特别是在1970年代,欧美主要国家的制造业就业绝对数量下降。欧洲每年下降约0.4%,美国每年下降约0.2%。而英国制造业就业从1966年就开始陡降。新增服务业岗位不但薪水低、技术含量低,且属兼职性质,并不稳定。而在1960年代之前,制造业可谓是发达国家的一大特色^⑤。在伦敦和纽约,制造业从业者的比例从1977年的20%下降至1990年代中期的不足10%^⑥。因此,从产业结构看,两轮全球化是反向的。第一轮全球化中,北方国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制造业导向的;而在本轮全球化中,北方国家经历着非工业化,南方国家则在追求工业化。

其次,经济活动的去本地化(垂直专业化),形成了国际产业链分工。全球化带来的市场一体化改变了以前的垂直一体化生产模式,后者的典型就是福特模式。市场一体化并没有把生产集中到某

① [西班牙]圭拉姆·德拉德赫萨:《全球化博弈》,董凌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② [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4页。

③ [英]彼得·迪肯(Peter Dicken):《全球性转变——重塑21世纪的全球经济地图》,刘卫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54页。

④ [英]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重塑21世纪的全球经济地图》,第455页。

⑤ [英]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重塑21世纪的全球经济地图》,第440—441页。

⑥ [英]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重塑21世纪的全球经济地图》,第449页。

一些地方,反而使生产过程细化为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分布到各个地区和不同国家。一部分生产活动可能保留在本国,而另一部分可能会转移到国外以寻找最大的比较优势,这就是所谓的垂直专业化,即各个国家在价值链的不同环节上实现专业化。当然,去本地化的过程主要发生在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中。例如,某个时期,芭比娃娃在美国售价 10 美元,设计公司可得 1 美元,但在中国香港的出口价格仅为 2 美元,其中包含 35 美分的中国劳动力成本和 65 美分的原材料成本。所以,大部分增加值仍然发生在美国。同样的例子非常多^①。在这种去本地化的过程中,由于商品生产成本大幅降低,利润率提高,且增加值主要被资本家获取,所以,资本家成为最大的获利者。普通民众虽然也获得了价格更低的商品,但同时丧失了许多工作机会,工资涨幅下降,甚至绝对下降。据统计,2005—2014 年世界 25 个高收入经济体有 65%—70% 的家庭实际收入停滞甚至下降^②。因而,贫富悬殊越来越大,成为美英等国民众反全球化的经济原因。

经济去本地化也导致全球劳动力竞争加剧,从而降低了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有学者认为,经济去本地化体现了资本的流动能力,使得资本对劳动力形成明显优势。这固然不错,但还不够。其实,在全球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劳动力的流动能力越强,劳动力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因而越会降低工资水平。因为劳动力流动到资本要去的地方,只能是去跟当地的工人一起竞争,从而使工资更低。譬如,如果许多美国蓝领来到中国,不会提高而只会降低中国蓝领的工资。反之亦然。美国没有将其劳动力市场全球化,这是美国推动全球化却又有贸易保护主义的一面。这对美国劳动者来说,是巨大的屏障和保护。如果没有这一保护措施,美国的工资水平还会剧烈下降。但即便有此保护,由于经济去本地化,也使美国的工资水平大幅下降。美国的低收入工人不仅需要面对进口商品的威胁,还要面对因资本外流提高了外国工人生产能力而产生的威胁。后者意味着,在一些中高端产品上,美国也面临后发展国家的激烈竞争。

(三)全球化加剧贫富差距

全球化对美国的资本家总体上是好事,因为美国的比较优势(资本、技术和管理)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低成本资源、能源、劳动力及不充分市场)相结合,给资本家带来巨大收益。全球化对于民众,则有利有弊。其利在于,美国民众享受了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降低了生活成本。其弊在于,资本的逐利本性,使资本家绝不会因为产业转移导致利润增加而提高国内工人的工资。同时,由于产业转移,美国中低端制造业工作岗位大幅流失,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进而导致工资相对下降。即便没有被转移的工作岗位,也因劳动力需求的总体下降而受到影响,工资增幅也会变缓。

问题在于:利能抵弊吗?——不能。工资增幅变缓导致的损失大于廉价商品带来的好处,这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而贫富差距扩大正是特朗普当选的经济基础或客观因素,同时也是民主内卷化的经济基础。研究表明,在美国,民众的收入增幅明显不如资本家。20 世纪 70—90 年代,贫富差距不断扩大^③。罗伯特·席勒指出,美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让 1% 的人口变得更富,财富更加集中^④。克鲁格曼也揭示了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贫富差别惊人加剧的现象。1973 年以来,尽管平均收入大幅提高,但家庭中值收入只有轻度增长,最大的好处则落入了极富者囊中。根据美联储的研究,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 CEO 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全职工人工资的 40 倍。但在 21 世纪初,CEO 的年薪平均超过 900 万美元,是普通工人工资的 367 倍^⑤。甚至,“二八定律”有向“一九定律”转化的倾向,即 10% 的人占有 90% 的社会财富。最新数据和研究表明,过去 10 年(2006—2015),英国人的实际收入

① [西班牙]圭拉姆·德拉德赫萨:《全球化博弈》,第 38 页。

② 赵灵敏:《中国人为什么很少反对全球化?》,FT 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1278?full=y>(2017 年 2 月 8 日)。

③ 林振淦:《美国社会的贫富差别继续扩大》,《世界经济》1990 年第 5 期。

④ 殷叙彝:《席勒论美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及对策》,《国外理论动态》2007 年第 9 期。

⑤ [美]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刘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年,第 96—112 页。

没有增长;2015年,美国95%的家庭收入仍低于2007年;欧元区的失业率依然高居不下。然而,最富有的1%拥有的财富持续增长^①。

全球化使资本家可以在全球投资,从而大大增加了资本家的投资机会,但民众的工作机会并未等幅增加,大多数民众仍只能在国内选择机会。其实,“二战”后这波全球化仍然是有很多限制的,就连美国也设置了不少市场壁垒,典型的就劳动力市场壁垒,美国不允许劳动力市场全球自由流动。即便如此,由于经济活动去本地化、技术进步、新机会分配不均等原因,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所以,西方国家的民众对全球化广泛存在幻灭感。

有一种观念误区,以为经济发展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其实,经济发展的逻辑是:经济越繁荣,贫富差距越大。因为经济越繁荣,意味着财富积聚越快。虽然经济发展对穷人也可能有好处,但“二八定律”(或者“一九定律”)决定了经济发展主要有利于富人。贫富悬殊扩大,不管它是以合法还是非法的方式造成的,都一定会导致相对贫困,进而导致民众的不满。在民主制度下,贫富悬殊究竟会导致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呢?

三、特朗普当选所体现的民主内卷化

(一)贫富悬殊、社会撕裂与民粹兴起

从不同角度,民主有许多本质。民主是多数人的意志,这可谓民主的最简洁且能获得最大共识的定义。同时毫无疑问,它也是民主的本质之一。但是,从这个本质(可以说是一级本质,即非派生本质)可以衍生出民主的另一个本质(可以说是二级本质)——分歧。分歧是民主的前提。分歧不再,民主便无意义。如果不存在分歧,那么,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也好,投票程序也罢,都不再需要。民主之所以必要,就是要协调分歧,达成妥协。同时,也不要将分歧仅仅看作是负面因素,分歧既是民主活力的源泉之一,也是更广义的社会活力的源泉之一。自由、多元,都必然蕴含分歧,没有分歧的社会是僵死的。但是凡事都有度,分歧可以激发活力,也可以制造分裂。受人类理性的限制,且社会生活不断发展变化,总有意想不到的新情况出现,以至于没有任何制度能够事无巨细地规划一切事情、考虑一切情况,从而预先消除一切分歧。这意味着,民主制度无法抽象、孤立地运行,协调分歧,就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需要人们在制度的基础上相互协商和妥协。帕特南(Robert D. Putnam,或译“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就是强调民主需要一定的运行环境,这个运行环境被他称为社会资本^②。社会资本包括诸多因素,如文化、情感、习俗、传统等,但最终落实到共识,并由共识建构信任,进而降低交易费用。

关于制度与制度环境的关系,有一个困境,就是制度环境永远不可能被制度化,被制度化了的东西就不再是环境,而是制度的构成。针对本文的话题,民主最重要的制度环境——共识,永远不可能被制度化。因为民主所要处理的,永远是有分歧的问题。要将分歧缩小到可控程度,以致不影响问题的解决,并且效率不至于太低,仅靠少数服从多数这样的基本原则是远远不够的。意志未获承认的一方,可以规避公开的原则,以暗力的方式来抵制他们所反对的方案。因此,即便某个方案获得通过,在执行过程中,也可能遭遇各种或明或暗的抵制,使问题得不到解决,或者大大增加解决问题的时间和难度。如果缺乏制度外的共识,民主很难有效运转。但是,共识问题的困境在于:当最需要共识之时,恰恰是共识最薄弱且最难凝聚之际。

在贫富悬殊的社会,穷人和富人很难不产生对立。2011年秋,美国上演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示威组织者声称,他们的意图是要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示威群众

① [英]莱昂内尔·巴伯:《2016年如何改变了民主?》,何黎译,FT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722?full=y>(2016年12月26日)。

② [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荣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5页。

打出“99%”的旗号,指出1%的人与99%的人的对立。这与罗伯特·席勒的研究结果非常一致,财富增量主要是使1%的人更富。

虽然贫富对立,但在民主制度下,大众可以用脚来投票,支持或反对候选人。失业、贫困和贫富悬殊容易滋生民众的不满和愤怒,进而形成民粹主义。财富分配非常不平等,是导致特朗普上台的重要原因。在民主制度下,每个选民都被视作平等、独立的原子化个体,每个人都有投票的权利。根据经济人假设,所有选民的投票行为都是出于自己的最大利益,并受有限理性的限制。那么,当贫富悬殊让大量中下层民众觉得自己利益受损时,他们并不会认真考虑(也很可能缺乏相应的理性能力)贫富悬殊和相对贫困的原因是什么。

在这种条件下,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紧张进一步呈现出来:资本主义必然导致贫富悬殊的日益扩大,贫富悬殊的扩大必然导致民主的内卷化,使民主日益倾向于民粹。这种民粹具体地表现为:民众对结果平等越来越看重。贫富悬殊,是民主这种制度的客观边界。这一边界使民主制度的边际收益递减,从而使民主制度内卷化。一方面,民众通过民主制度对资本主义寄予厚望,希望资本主义能给他们带来更多财富(这犹如农业生产中劳动投入不断增加,劳动者希望土地的产出增加)。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虽然能极大地激发生产力,但它并不具有无限的经济功能,它所能生产的财富也是有限的(这犹如土地的产出是有限的)。同时,资本家也总是希望获得更多利润。这使得资本主义能分给大众的利益是有限的。虽然民众的绝对财富也可能增长,但考虑到贫富悬殊,民众从资本主义制度中获得的相对回报率却越来越低。于是,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就趋于紧张,民主就走向内卷化。如果贫富悬殊的速度加大,则客观边界收缩,民主内卷化的速度也相应加快。

首先,资本主义必然导致贫富悬殊的日益扩大。无论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还是自由主义经济学,都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在这个意义上,克鲁格曼虽然从自由主义者良知的角度反思美国,但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良知与理智是冲突的。从道德角度,他反对贫富悬殊,这毫无问题。但是,如果坚持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即便辅之以国家干预和福利制度,贫富也必然日益悬殊。所以,克鲁格曼永远无法解决他的道德与理论的冲突。一般言之,如果一个自由主义者持有反对贫富悬殊的道德主张,那么,他的道德主张与理论主张是不可兼容的。贫富悬殊是人类的老问题,从来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可见的未来也不可能解决。相对而言,自由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是最优的。为什么?自由资本主义从财富生产和财富分配两方面都相对较好地缓解了贫富悬殊问题。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它追求资本增殖,追求财富。同时,福利制度保障了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相对于古代,由于生产力提高,富人积聚财富的成本更低,因为他们从财富增量中分得更多,这种致富方式可能产生的暴力和遭遇到的阻力都较小。而在古代,由于生产力进步较慢,富人一般通过改变财富存量的分配来致富。这意味着,致富经常会使他人的财富减少。譬如,土地兼并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绝对贫困问题大体解决了,相对贫困却越来越严重。即便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能够实现,也不能改变这一趋势。帕累托改进是一种典型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自由主义哲学中也可以被解释——只要我不损人,就可以自利。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即便满足帕累托改进,贫富悬殊及相对贫困也必然扩大。

相对贫困的扩大,必然引发下层民众的不满。这种不满集中起来,就形成一股民意,继而催生民粹。之所以称为民粹,是因为它更看重结果平等,而一切强调结果平等的主张,都有或多或少的劫富济贫的意味,而这属于损人利己的主张,当然也是违背帕累托改进原则的。

(二)特朗普利用民粹与民主内卷化

那么,对于一名政治家,该如何对待民粹?从特朗普的表现看,他显然是在利用民粹。导致贫富悬殊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中下层工作岗位流失,所以,特朗普宣称,“把工作带回美国”。这固然没有错。但是,特朗普试图采取什么手段呢?限制移民,遣返非法移民;退出TPP;准备对中国产品增收高额关税;大规模减税,如试图将企业最高所得税从35%减至15%;等等。

特朗普的政策会奏效吗?特朗普的上述措施(除开减税),其直接目的都是增加美国的就业岗位。但是,这些手段都属于保护主义而非开放主义。减少移民,看似增加了就业岗位,但劳动力成本会提高;同时,如果准备对中国产品增收高额关税,美国本土产品价格将会大涨,并且,中国产品主要是中低端产品,直接关系民众日常生活,因而也会增加劳动力成本;退出 TPP,也会导致美国的贸易成本上升。上述三者结合起来,美国本土制造成本只会比现在更高。如此,这种产品不但在国际上将毫无竞争力,也很可能没有国内市场,因为国际上同类产品的价格可能低得多。即便对中国产品增加高额关税,将中国产品排除在国门之外,美国又将如何对待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低成本的中低端产品呢?譬如,东南亚国家的劳工工资比中国还低。此外,如果第三国将中国的产品转口销售到美国,美国又将如何对待?或者,中国商家将生产能力转移到美国的临近国家,雇佣当地工人(也可以同时雇一部分中国工人),这种产品就不再是“中国制造”了,美国又将如何对待?美国是否要关起门来,不要国际贸易了?所以,要使美国的中低端制造业回流,是很难的事情。

上述政策导向,特别是大规模减税,与缩小贫富差距南辕北辙。减税可以刺激投资,促进经济,也可以让穷人获利,但根据“二八定律”(或者“一九定律”),其主要获利者是富人。譬如,个人所得税都有起征点,能被征收个税的都不是穷人。所以,减税只能有利于中等收入以上的群体。因此,此项政策一旦实施,贫富差距势必进一步扩大。这意味着,无论特朗普意志多么坚强,他都绝不可能兑现缩小贫富差距的承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决定了的。最近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史甚至更长时段的经济史表明,在和平时代,贫富差距一直在扩大。

能缩小贫富差距的手段只有两种:战争和斯大林主义,但这两种方式都是不可持续的。关于战争,可以用中国的历史来证明。中国历朝历代的动乱和王朝更替,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贫富差距扩大。在古代,因为社会财富增长很慢,致富者经常是通过改变财富存量来致富,譬如土地兼并,“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这种贫者益贫,是财富量绝对下降,是绝对贫困。当贫富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大规模战争。这种战争以大量人口死亡和财富毁灭为代价,释放了长期积累的无序社会能量。通过这种严重代价,新的王朝对财富(尤其是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使社会恢复一定程度的实质平等和起点平等。然后,又开始新一轮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和积累,并必然进入下一轮战争,如此循环往复。而斯大林主义是乌托邦的衍生品,它的初衷其实就是为了遏制贫富悬殊。但是,它利用国家暴力,将一切社会资源垄断在国家手里,让国家的代理人即官员来掌握社会财富。在一定时期内,这种方式可能将贫富悬殊缩小到一定范围内,但结果只能是均贫,而不可能是均富。因为这种方式主要是通过分配来实现一定程度的结果平等,而无法刺激更重要的方面即生产。当财富增量速度很低甚至下降,无论怎么分配,都不可能让人们过上富裕的生活。同时,由于斯大林主义的组织力量是垄断社会资源的官员,因此,它势必形成以官员为核心的特权阶层,并依照官员等级获得特殊利益——这在斯大林主义国家没有例外。所以,斯大林主义也势必形成贫富悬殊,并且这种贫富悬殊是以国家力量推进的。因此,即便战争和斯大林主义可以获得短期内相对的结果平等,它也是不可长久的。最重要的是,它是极其血腥和暴力的。

利用民粹,特朗普上位。例如,限制甚至遣返非法移民;呼吁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指责墨西哥送到美国的都是问题人员;应该关闭部分地方互联网,那些主张言论自由的人都是白痴;赶走叙利亚人,监视清真寺……或许,有人会质疑:难道希拉里上台就不是民粹?希拉里的选民票数其实高于特朗普,只不过选举人团票数低些。按照民调和预测机构的预期,特朗普的选民票数和选举人团票数都应该低得多,但实际远高于预期,所以,民粹力量高于先前的估计。当然,我们无法指责特朗普动机不纯,重要的是,他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制度和程序。同时,民主本身就是民意至上,迎合民意。

问题是,特朗普能与民粹和谐相处吗?不可能。当前美国民粹的基础是贫富悬殊,但是,特朗普绝不可能缩小贫富悬殊。所以,特朗普要么被民粹裹挟,要么背叛,并打压民粹。前者,意味着他将进一步撕裂美国,给美国和世界带来麻烦。即便如此,他也无法满足民粹的要求,资本主义的客观规

律使他无法有效缩小贫富差距。福山最近也指出,就强大的利益集团劫持美国这个问题,特朗普并未拿出任何制度化的解决方案^①。

可以说,特朗普是在利用民主——这种利用当然没有错。但是,特朗普是在消费和透支民主,而不是生产民主;撕裂美国,而不是弥合美国;瓦解共识,而不是凝聚共识。虽然分歧是民主的前提,但民主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化解分歧。特朗普的竞选和当选引起了支持和反对特朗普两派的激烈较量。然而,特朗普的言行并非消弭而是增加分歧,增加了不同意见群体之间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增加了撕裂美国甚至撕裂世界的可能性。2017年初,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七个伊斯兰国家的公民入境,引起强烈反弹,最后被法院宣布该命令暂时终止执行。虽然特朗普的命令被终止了,但分歧肯定是加剧了。难怪,《时代周刊》将特朗普评为2016年度人物,并配以文字“美利坚分裂国总统”(PRESIDENT OF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

特朗普的当选反映了民主的内卷化。内卷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难说起点和终点在哪里。但特朗普的当选及其举措,既是民主内卷化的表现,也是加剧民主内卷化的原因。民主得以有效运行的关键在于,民主基于良性社会资本尤其是社会共识,以尽可能低的社会成本达成妥协,提高效率。而民主内卷化主要表现为,由于社会资本尤其是社会共识的流失,导致民主越来越难达成妥协。党派利益之争、集团利益之争、精英集团内部之争、民众与精英集团之争、民众与民众之争,相持不下,互不妥协,并且每一方都振振有词,相互指责,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方是错误的,从而导致民主的效率越来越低。虽然上述斗争在民主制度下一直存在,但不能因此认为民主一开始就是内卷化的。民主内卷化表现为,虽然民主制度这个底盘仍然存在,但这些斗争越来越严重,效率越来越低下。尽管缺乏衡量美国民主制度运行效率的具体指标和数据,甚至很难测度民主的运行效率,但事实证明美国民主制度运行的效率在走低。2016年美国大选中两派人马的相互攻击甚至诋毁,可以说明一部分问题;特朗普的竞选主张及其当选后的“新政”所引发的分裂,也可以说明一部分问题。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美国民众的经验感受:民主的效率大幅降低。因此,美国民主正在走向内卷化。

四、结语:民主,何去何从?

根据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贫富悬殊只会越来越大,所以,民粹主义会越来越有社会土壤。由于民粹主义突出地表现为要求结果平等,这就产生了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即:贫富悬殊必然扩大的经济趋势与民意要求缩小贫富悬殊的矛盾。而“民粹主义+民主制度”,很容易产生利用民粹的政治领袖,特朗普当选就是这样的案例。那些利用民粹的政治领袖,不但不会努力消除冲突,反而会扩大和制造冲突。而这种冲突必然导致大众与精英的对立,从而导致社会共识的流失,于是,民主变得更加低效,其边际收益递减。这时,社会治理无法指望大的制度变革,而只能寄托于对民主细节的修补,使民主与法治更加精致,这就是民主的内卷化。

但是,不可据此得出反民主的结论。一切制度都必然内卷化,人类没有设计出也许永远设计不出完美的社会制度。比较而言,民主的自我修复能力和修复空间都可能是相对较大的。譬如,不论“穆斯林禁令”是否合理,其被法院裁决暂停执行,就表明总统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约束。可见,在人类的诸多制度中,民主的修复能力仍然是相对较强的。

虽然民主的修复能力较强,但它毕竟存在内在矛盾。人类追求更加卓越的理想和动力,驱使我们超越民主内卷化,去创造更加卓越的制度。在这个意从义上,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民主,将何去何从?

[责任编辑 刘京希]

^① [美]弗朗西斯·福山:《美国已成失败国家》,听桥译,澎湃新闻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01553(2017年1月17日)。此文原刊于英国 *Prospect Magazine* 2017年1月号,原题“America: the Failed State”。